

宛如西方一场隆重的礼拜,当祖籍山东昌邑的文化学者刘爱敏参与进家族盛大的祭祖典礼时,她能感受到一种家族亲情与力量的存在。

家风也是一种信仰。百年前,学者辜鸿铭和陈寅恪曾说,家规、家风便是等同于西方宗教的中国百姓信条,团结和教化着每个中国人。

家风也是一种信仰



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近日问世。(山东大学供图)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一篇祭文的家族力量

一切荣誉感和家族责任感,都从那篇父亲交由她撰写的祭文开始。

刘爱敏从未把自己的人生,与东汉皇帝刘贺联系在一起,直到家乡迎来一场大型祭祖活动,她一辈辈地对祖先的过去进行梳理时,一个家族的兴衰全貌才让这位山东大学副教授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我发现,我们家族竟然起源于昌邑的东汉皇帝刘贺,我还找到了家族中,一位近代和林则徐同样重要的人。”刘爱敏说,在清末,她的家族中曾有一位少保,是嘉庆皇帝的老师,还曾任云贵总督,叫刘藻。“他为人谨慎,清廉仁义,因为与缅甸作战失利,且误报军情,于是畏罪自杀,对此,乾隆震怒,让刘藻的家族不能为他立碑列传,这个人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通过刘爱敏的发掘,这位被历史湮没的晚清封疆大吏重回家族史,同时被她找到的,还有刘贺以后昌邑涌现过的诸多知名人士,这片肥沃的文化土壤也因此让刘爱敏着迷和敬畏,她为拥有这样的先祖而骄傲。

传统社会以伦理和家族法则来维系,其社会基础就是宗族家庭,家族就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认为,无家族无以成社会,无家族无以成人生。

甚至家庭的繁衍生息支撑着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兴衰起伏。“例如,科举兴盛起来以

后,许多农耕家庭通过学习和科举产生了第一代官员,官员又督促后代学习、传家,再科举、入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刘爱敏说,这种规律在明清的文化世家中特别多,与如今“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何其相似。

而家族的延续更在于它能联系起独立的社会个体。学者辜鸿铭百年前与欧洲学者辩驳时便提出,家庭的存在,对于祖宗和长辈的敬畏,以及家风和家规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宗教,它替代了欧洲通过神化和恐吓树立权威来教化民众的做法,甚至优良的家风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公民,起到法律和军队和警察等强制手段都达不到的作用。

“中国的这种家庭宗教不需要恐吓,结合神话,而是通过对家人的责任和亲情来达到。”刘爱敏坦言,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中国人其实相信亲情和宗族,而且很多人越是年老,越希望在家族中生活。

28个山东世家的“密码”

去年,在一次大型讲座中,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谈到对外传播时,也提及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他说,虽然很多中国人信奉儒家文化,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时,他觉得孔子过于“远古”,缺少现代性的延续载体。

“其实,对于家风的研究,正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剖析传统的社会和人生,会对当代人起到某种启示。”王志民说。

今年1月14日,经过山东大学联合全国近百位学者历时4年编纂,我国首个家族研究书系《山东文化世家研

究书系》问世。书系选取了孔家、孟家、牟家等在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学、艺术、教育、思想、科举等方面有代表性的我省文化世家28家,记录他们的兴衰流变,揭示其以“文”影响社会和地区治理的特点。

“在山东,很少有以商贾为基础的文化世家,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商贾更注重赚钱,而忽视科举入仕,也就无法形成文化世家。”参与编纂的刘爱敏说,山东的文化世家往往经历由文化之兴,到科举之荣,再到仕宦之显的发展过程。

王志民认为,“在这其中,一个家族内部的精神连线和传家珍宝,传递着先辈对后代的寄望和父祖对子孙的诚勉,也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培育的重要先天环境和成长土壤。”

另外,人才辈出的文化世家,又往往成为一个县、州或更大区域内的文化地标,其显赫门第以及通过仕宦、联姻、交游、著述、教育等形成的文化传播力深深影响着一个个地域的文化发展,不仅提升了一个区域的文化水准,同时也起到社会治理当中对道德层面的约束,这种家风影响力在当下已经难以重演。

“假如我们重视家庭教育,重视家风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育和道德约束,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孩子从事极端行为,更不会出现那个11岁小女孩将1岁小男孩扔下电梯的极端案例了。”山东省政协常委孙炬表示。

刘爱敏则觉得,当我们重新去寻找和审视家风,那些家族中过去的人和事,给我们荣誉,也让我们自省。

我省28个文化世家

济宁:孟氏家族、孔氏家族、清代济宁孙氏家族、嘉祥曾氏家族、颜氏家族
潍坊:临朐冯氏家族、明清诸城王氏家族、清代诸城刘氏家族

德州:苏禄王后裔家族、清代德州田氏家族、齐州房氏家族

临沂:兰陵萧氏家族、汉晋高平王氏家族、南朝东海徐氏家族

济南:章丘李氏家族、明清新城王氏家族

聊城:清代聊城傅氏家族、清代聊城杨氏藏书世家

淄博: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明清博山赵氏家族

烟台:明清莱阳宋氏家族、清代栖霞牟氏家族

青岛:琅琊诸葛氏家族、魏晋南北朝琅琊王氏家族

泰安:两晋泰山羊氏家族

滨州:清代海丰吴氏家族

菏泽:宋代巨野晁氏家族

世家解码

傅氏家族科举兴盛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文化家族的出现,是区域经济、文化发达的表征,而某些文化家族致力举业,世代不衰,则与家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密切相关。在这里,我们想从三个方面探讨傅氏家族举业兴盛的原因。

经济发达是文化兴盛基础

明代大运河畅通后,聊城因邻近运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明代早期,聊城已是运河沿线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入清之后,华北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山东运河区域商品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聊城城市经济功能明显加强,商业尤有长足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达是文化事业兴盛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是文化发达、科举兴盛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然为文化事业投入更多的财力,从而促进学校教育及其他教育事业的兴盛。经济发达地区富裕家庭和家族相对较多,这样的家庭和家族中的学龄青年无衣食之忧,能够潜心举业,有更多机会接受名师指导及从事文化信息交流。聊城城市经济的发展,养育了多个举业兴盛的文化家族,都是因科举而兴盛的文化家族。傅氏家族是其中的典型和代表。

聊城商业经济的发达造就养育了这些科举文化家族。

区域文化积累

聊城古为齐之边邑,地近鲁国,受儒家文化浸润,是文化发达的区域。秦汉时期,聊城属东郡,隋唐为博州治所,乃区域政治文化中心,历宋元至明,仍“盛修诗书之业”,到了清代,依然是“士多才俊,文风为诸邑之冠”。文风昌盛,士多才俊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与明清时期聊城的区域文化环境也有直接的关系。

清代前中期,大运河是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全国各地的官员、学者、参加科举的儒生等经常往来于运河上,或从南方的杭州及苏州、扬州等地北上京城,或者从京城到达南方各地。他们沿途办理公务、驻足游历、访朋会友、授徒讲学,使聊城的学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著名学者及高水平的科举人才。

聊城书院数量多,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达。书院的数量规模,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外在表现,而且,北方的书院大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所以,科举的数量,与书院的数量,特别是书院的教育水准及教职人员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关联。

家族文化传统传承

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才是科举家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家族成员取得一定层次的科举成就之后,那么家族其他成员特别是他的后代就会有更多取得科举成就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取得科举成就的家族成员总是力求让他的同宗或后人继续自己的事业,会将自己积累的成功经验传授给家族其他成员;一方面家族其他成员及其后裔会因为前人取得的科举成就而自豪,并引以为榜样,继续前人的辉煌,这种所谓“马太效应”已经反复为中国文化家族的科举活动所证实,而这种积累的优势正是科举家族得以延续的动因。

清朝入关后的第二年,傅以渐便考中了举人,这是聊城傅氏家族史上的第一个举人,次年,傅以渐又高中状元,状元是科举阶梯中的最高等级,是官方认定的全国文化水平考试的冠军,更何况这是清朝开国的第一位状元!整个清代,傅氏家族一直以此为荣耀。

状元门第的金字招牌,御赐门联的高贵堂皇,将傅氏家族引导上科举入仕轨道,孜孜追求,心无旁骛。明代傅氏家族有不少人经商,他们以商养学,拿钱供养自己的子孙或族人攻读举业。

世世代代“业儒”,“家诗书而户孝友”,这是傅氏家族的特点,是其家族文化传统的体现,也是傅氏家族科举人数多的根本原因。

摘自《聊城傅氏家族文化研究》

聊城傅氏家族的家风

忠诚正直 轻财好义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作为一个延续数百年的文化家族,傅氏家风又有显明的特点。

傅氏家族中任官者多达数十人,有的任中央政府各部门官职,最高者至大学士;有的任地方官员,既有巡抚、布政使、知府等中高级官员,也

有品级较低下级官吏。其共同特点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

傅以渐的政治品德与生活作风,受他穷苦出身及生活经历的影响,与他的经历及文化修养也有直接的关系。

安贫乐道、清正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后来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

傅氏家族安贫乐道,清正廉洁的家风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晶。

傅以渐位居大学士,平民之家变成了高官门第,但轻财好义的家风仍没有改变。

早在明代,聊城傅氏家族中的许多人便表现出忠诚正直的行为风格。

傅以渐是傅氏家族史上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的政治品格和生活作风对于家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忠正直言逐渐成为家族风气,代代传承。至晚清与傅氏家族的豪侠之风相融汇,正直敢言的家风更为彰显。

摘自《聊城傅氏家族文化研究》